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1 期 (第 10 卷)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1 2011 (Vol. 10)

20 世纪 2、30 年代南阳盆地农村社会经济的衰变

刘振华

(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在 20 世纪 2、30 年代,日益"边缘化"的南阳盆地在遭受过往军队苛征和地方匪患的骚扰下,社会秩序全面崩溃。南阳盆地社会生态的衰败造成当地土地荒芜、农民逃亡(离村)人口剧增、农村副业由盛而衰、交通秩序破坏,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南阳盆地社会秩序的崩溃和社会生态的衰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当地农家生活已降低至最低水平。

关键词: 南阳盆地; 社会生态衰败; 农村经济; 农家生活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 - 0202(2011)01 - 0149 - 08

近年来,学界对区域史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区域遍及全国,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遗憾的是,这种学术研究总体呈"地区性发展不平衡"态势,学术界对华北、江南及粤闽等地倾注热情多,对其它地区关注不够,学术成果明显偏少。为避免仅仅关注"腹地"或"核心区域"的研究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加强对"边缘地带"的研究则显得非常必要①。

南阳盆地位于豫、鄂、陕三省边界,介于黄河、淮河与长江流域之分界,主要有白、唐、湍、淅(丹)四条河流,属汉水流域[1]93。晚清以降,随着南阳盆地社会的衰败,南阳盆地社会经济遭遇亘古未有之衰变,张衡笔下"于显乐都,既丽且康"的"南都"沦为"土匪世界"、"盗贼渊薮"[2]1。本文在借鉴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南阳盆地为中心,通过对 20 世纪 2、30 年代南阳盆地社会生态、农村经济、农家生活的研究,考察南阳盆地农村社会经济的衰变及其造成的社会后果。

收稿日期:2010 - 11 - 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ZS051);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课题(07JJD770104)

作者简介:刘振华(1979—),男,河南唐河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

① 从地理区位来讲,河南一般隶属于华北,如民初学者白眉初曾撰《冀鲁豫三省志》,豫省与冀、鲁两省同属华北。经济地理学家孙敬之认为华北区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及北京、天律两市,见孙敬之等编著:《华北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 页。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华北地区地处黄河中下游,大致在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包括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北京、天津和周边地区。有关"华北"的概念,笔者基本赞同孙敬之的看法,河南省大体上属于华北的一部分;而南阳盆地在地理上接近华北平原,但它是汉水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南阳盆地区域社会经济兼有两个地域的特点。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把南阳盆地划入长江中下游区,河南除南阳、信阳外,余属华北平原区,见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农业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49 页。本文所述的南阳盆地即从经济地理意义上来讲,在区域上即清末至民国时期南阳府(1933 年后为河南省第六行政区)所辖的南阳、叶县、舞阳、方城、南召、镇平、内乡、淅川(厅)、邓县、新野、唐河、桐柏、泌阳等 13 县(厅)。

学界涉及本文主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少华、江凌:《明清时期南阳盆地的交通与城镇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1 年第 5 期;沈松侨:《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 年版;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7 年版。

一、南阳盆地的衰败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

在近代铁路、公路兴修之前,南阳一直是荆楚地区和中原间的重要通道,也是控扼华北与西南驿道的要冲[3]。唐、白河曾经船只往来不绝,北通汝颍、南达江汉的航运干线对南阳盆地的开发及域内城镇的兴起与繁荣,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哲学家冯友兰曾如此描述其祖籍唐河:"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来说都是熟悉的。"[4]

清末,自平汉铁路开通以后,交通干道由此东移,荆襄驿道地位也随即下降,位于内陆核心地带的南阳盆地逐渐被边缘化,渐失水陆交通枢纽之优势。更为严重的是,盆地周边山地自明清以来遭过度开发,自然生态遭严重破坏[5]。清末民初,南阳西北部山区"任意采伐……山遂童秃"[6]。由于森林生态破坏严重,导致水土流失,唐、白二河上游水量锐减,河道淤塞源,舟楫难行,只有在夏秋间涨水时,唐、白二河方可通行帆船直达汉口。至光绪末年,繁盛一时的赊旗镇,"下百里许即不通舟,商贾日稀"[7]。

据东亚同文会调查:"由于铁道(京汉铁路)开通,铁道势力在其沿线及向西开拓,河南西部的交易大受其影响,于是赊旗镇的繁荣急转直下。"[8]清末,唐河上游淤塞,唐河上溯之客货渐集于唐河县北的源潭镇,自铁路开通后,"唐河贸易即渐为其所夺。"[1]43随着豫南货源大量转入铁路沿线的许昌、驻马店、信阳等地,源潭镇失去水路运输的优势后更加衰败,关帝庙内的川陕会馆变为空闲[9]。总之,由于近代交通东移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南阳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水陆交通枢纽的优势。

近代南阳盆地的社会环境处于持续恶化的状态。地处兵事要冲的重镇南阳,"全境除西北诸山外,一片平原,绝无关扼可守,加以地当京襄孔道,夙为历史名区。"[1]98民初以降,政局不稳,南阳驻军庞杂且交替频繁,北洋军阀内部不同派系、西北军与河南土著部队"镇嵩军"、"建国豫军"等先后盘踞南阳,各路军阀在南阳盆地互争地盘和对当地的苛征盘剥,极大地恶化了当地的社会生态,加速了南阳盆地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崩溃[10]23-29;[11]。

1927年,杨虎城军在镇平驻扎不到一年,征支军麦5000多石(折125万公斤)[12]。岳维竣部次年驻扎镇平时,全县兵差支应80万元,其他民间所派车、牛等还无数。1929年,石友三部在镇平约派款20万元,次年竟派至50万元[13]78。

在邓县,自1926至1932年,樊钟秀部、于学忠部、吴佩孚路过入川,孙连仲、岳维峻之南路东征,均以邓县为行营,"每驻一次兵,县城内必预备支应局或维持会以招待之。"[14]18 1929年,西北军石友三部进驻邓县,肆意搜刮。1930年8月,西北军刘汝明部先锋团李金田部至邓县赵楼寨派粮被拒后,攻陷赵楼寨,杀民众3000余人,寨内财物被劫一空[15]。1932年,刘镇华的第11路军强向邓县征收军麦50万斤,恰值旱荒相继,农民收成微薄,除卖儿鬻女外只得拆房卸屋,零售砖瓦木料。当年,邓县外卖镇平、内乡的砖瓦木料及农器家具等日均在30车以上[14]19。

淅川县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为各路军阀争夺的重点,荆紫关重镇受害尤重。民国以来,"独因界连三省,交通不便,兵匪交侵,无时或息,地方糜烂,甚于他处,此实河南最可痛心之事也。"[1]158 1924年4月,刘宝斌(镇平杆首,被镇嵩军憨玉琨部收编为团长)部征洛阳战败后,从陕西袭击淅川荆紫关,北街焚烧殆尽。1925年5月,胡憨之战后,憨军残部刘士杰等各带人枪二三千不等,盘踞淅川,成立"卫民豫军",向百姓摊派供给。同年11月,陕西陆军第二师张治公部由白河县直抵豫境,进驻淅川县城。1926年秋,陕西杆首王老五等假冯玉祥部退役师长宋谦招抚编为旅长的名义率5000余人进驻荆紫关。1927年春,孙连仲率万余人由陕西进驻淅川荆紫关,半年后离

去,岳维峻续率两万人至荆紫关。同年,陕军张治公等部相继驻巡淅川。1928 年秋,湖北鄂阳杆首赵六娃率千余人,持被陕军收编为团长的公文驻荆紫关,勒索地方。各路军阀来县,给养全由地方供应,时有“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的歌谣[16]。

1925 年 2 月,吴佩孚命西路联军张治公部入内乡城,向各区索军费 9 万元(银元),在开赴南阳前又向内乡索款 20 余万元(银元)。1928 年初冬,石友三部驻内乡,提取民团枪支 2000 余支,索军费 4 万元(银元),临走又收曹沟、麦子山等处步枪数百支。1929 年 11 月,蒋冯战争开始后,冯系刘汝明部出荆紫关东进,蒋系杨虎城部(1929 年,蒋、冯关系濒于破裂时,杨率部附蒋)由南阳西攻。11 月 12 日,冯军李金田率部由淅川攻师岗,13 日抵内乡县城,下旬蒋军总反攻,杨虎城部重占内乡[17]。

方城居许宛通衢,当南北要冲,兵差、派款尤为繁重。据国民党方城县党部调查:方城每年因兵事“需用车辆不下六七千辆,损失达 30 余万元,农夫耕牛,咸供差役,废职荒田,生产减少,车辆之破坏,牛马之死亡者,其损失更不可以数计”,“来往军队众多,招待浩繁,统计维持会专办兵差九个月之账目,支出 30 余万元,加以各区乡镇,层层靡费,各自为政,自行派收,催款员役之额外需索,经手部处之扣折中饱,每年何止百万之巨。”[18]。

宛东泌阳县由于地形复杂险要,素有“淮西门户”、“宛东屏障”之称,军阀驻军泌阳更替之频繁不减于南阳县城,遭遇军队之盘剥尤重。1925 年,陕军岳维峻部驻泌阳,供给全由地方摊派,逢年过节,索要猪、羊、酒等物。岳部驻沙河店的曹绍文旅,端午节时,向沙河店索要银币 5000 元,群众愤怒地说:“能让土匪烧杀,不让陕军驻扎。”1927 年 2 月,在泌阳驻扎的吴佩孚部陈文钊旅,强行预征三年田赋。是年,泌阳县境曾五次驻军,多达四万余人。每次必强行摊派,搜刮存粮,致使部分居民柴米俱罄,流离失所[19]249-250。

南阳盆地不仅遭受驻境及过路军队之苛征,地方派捐亦是一笔很大的负担。1930 年后的镇平、内乡、淅川、邓县等办起地方民团,每亩征收 2 升(折 5 公斤)小麦作民团费用[12]108。南阳县自 1932 年将全县土地实行丈量后,除仍按粮银每 1 两(即每地百亩合赋银一两)纳银币 5 元外,另分土地为五等,每亩年纳地亩捐 2 角至 5 角(此项地亩捐,全县年收 120 万元),作为地方教育、建设、民团、行政、公安、自治之经费。若遇临时需用,则仍向农民征收。在唐河县,“每粮银 1 两纳银币 9 元 2 角,除县教育,建设,民团,公安,行政等费由此开支外,其他自治及一切临时费用,皆临时征派。”[20]3

至于临时杂派,“则唐河繁于南阳”,而其中之大部分,皆为驻军之勒索,如:电杆费、电线费、壮丁训练费、征兵费、给养费(内分现款,柴草,面及鞋袜等)、剿匪费及其恤金、救国捐、开拔费,及壮丁小夫车辆之征派,就中车辆之征派尤为农民最大之损失[20]3。曾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峙回忆:“当时大局初定,河南又为四战之地,驻军来来去去,有时多达 30 万……中央财政困难,河南境内驻军饷糈,令由河南自筹……以致地方负担过重,几难支持。”[21]121

在 20 世纪 2、30 年代,由于军阀混战,南阳盆地及周边地区饱受军阀混战及苛征之灾害,造成当地军政秩序混乱不堪,社会生态严重失衡。

英国学者贝思飞认为,在“那些长期贫穷或周期性地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那些传统的经济模式已经崩溃的地方,当农事不再可为,其他生计也缺乏时,就会成为骚动蔓延的地区。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或是在国家、省、县的边缘地带,行政管辖形同虚设,也会出现为了生存而直接反抗的洪流”[22]。从南阳盆地近代自然、社会生态的演变来看,当地的社会现实“使人找不到别的生路”,非常符合上述条件,南阳盆地自然成为孳生土匪的“渊薮”。1914 年,北京政府内务部训令:“豫省南阳一带,山麓丛杂,素称盗薮,改革以来,游勇散兵,啸聚尤众,迭经军队剿捕,而地当豫、鄂、秦三省

毗连,此击彼窜,迄未尽除。"[23]

南阳盆地社会环境的持续恶化导致该区域政治秩序的失控。军阀政府的压迫,地主豪绅的剥削,加之战乱频仍、天灾连年等因,破产农民无以自存,被迫铤而走险拉杆为匪,南阳盆地社会秩序完全崩溃。1923 年,仅南阳县境内百人以上的杆匪就有 30 余股,匪众 6000 人以上,而百人以下的零星小杆无数[10]195。南阳县城虽为豫西南重镇,镇守使署所在,"而土匪纵横,无间昼夜"。全县 2000 余村,"被匪焚烧抢拉者,约有 1800 余村。"[24]土匪不但窜扰村寨,就是县城和较大的集镇也未能幸免,惨遭土匪洗劫。1920 年 11 月,"老洋人"(张庆)率众数万围困泌阳县城两日,城内送出 500 块银元后始解围。1922 年 11 月,"老洋人"又率部攻破泌阳城,大肆抢掠[19]14。1929 年 8 月,各路杆匪啸聚 6000 余人,攻破镇平县城,烧毁房屋 9000 余间,掳掠县长及肉票万余人[25]21。1931 年 4 月,崔二旦杆匪盘踞唐河县城 18 天,大肆抢掠[26]。曾任南阳专员的朱玖莹也承认:"南阳高城深池,亦昼不为市。"[25]2为避匪患,不仅大地主,就是较有钱的富农、中农也急速向城市迁移,南阳城由 2 万多人剧增至 4 万多,躲避匪患几乎是唯一的原因[27]21。

接连不断的灾荒与兵匪之祸相互激荡,对南阳盆地农村的打击尤大。镇平从 1928 年以来,无一年不在灾荒中。1928 年旱灾;1929 年匪灾;1930 年水灾;1931 年麦荒,收成毫无;1932 年春匪灾,秋又不收[13]108。1929 年,河南全省 112 县无县无灾,灾民达 1550 余万人,宛属 13 县灾民竟达 2411122 人,占全省灾民总数的 15.6%,足见灾况之严峻[28]。

总之,近代以来,南阳盆地渐失交通之利,商业萧条,当地驻军的频繁骚扰与匪患的猖獗,加速了南阳盆地农村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而豫西南土匪之多,"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破产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更促进了农业危机之更深一步的危机。"[29]。

二、南阳盆地农村经济的破产

20 世纪 2、30 年代,南阳盆地因社会秩序崩溃,不断遭受土匪骚扰,土劣、政府、军队的任意摊派,加之水陆交通不畅,诸种因素致使南阳盆地农村经济已濒临破产边缘。

其一、南阳盆地社会秩序崩溃,土地大量荒芜。从 1928 到 1933 年,邓县的东乡由红枪会控制,西乡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区因农民流亡,形成几十里荒草区域,土地荒芜 80 余万亩。县城西关赶集卖柴的农民,担子上都挑着野鸡、野兔[30];[15]27。姚雪垠曾进入荒区:"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鸡乱飞,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处处。"[31]。毗邻邓县的鄂北襄樊、枣阳等地亦因兵匪掠夺,一片荒芜。因土匪蹂躏,鄂北"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尚未归耕;吕堰驿及黄龙垱等处,荆棘弥望,狐兔噬人,人烟断绝,亟待垦殖"[32]。1933 年秋,《申报》记者陈赓雅由武汉赴鄂北采访前,友人即叮嘱他"须防兔噬",他当时"以为戏言,或乃匪劫隐语"。当他到襄樊时,"见乡人多食兔肉,角半即购一头。"[33]由豫西南、鄂北一带野兔噬人之事实,可见南阳盆地因匪患猖獗造成农田荒芜、农村衰败之惨状。

1932 年,南阳县既耕土地 2351464 亩,占该区土地面积的 39.19%,荒地 3273615 亩,占该区土地面积的 54.56%。除去西部山岭、岗地外,大部分荒地是可以改造为熟地的。如果这些可垦的荒地都开垦以后,则南阳的耕地将增加到占全面积的 50%[27]16。由于兵匪骚扰不断,各种捐税负担沉重,农民的再生产能力日益收缩,无力开垦荒地。唐河县仅民有荒地就达 1133725 公亩,"皆备受天灾人祸而无力营耕,或因灾因难散之四方者所有之土地也。"[34]

豫西南地区,"荒地愈多,生产愈少,饥荒愈甚,饥荒愈甚,盗匪愈多,盗匪愈多,荒地愈广,恶性循环发展到良民与盗匪无从辨别的阶段。"[35]而这些荒地的所有权,日久往往就落到少数地主、豪绅手里,这是促成豫西南一带田权高度集中的主要契机[13]2。

其二、农民逃亡、离村人口急剧增加。据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在南召,县府派款繁多,民团下乡,吃喝都得供给。没有钱的拿家具,家具拿光甚至连房屋都要拆。许多农民“大牛变小牛,小牛变无牛”,田地卖完卖家具、房屋,甚至妻女。在内乡,别廷芳为筹自治经费,各种捐税、派款名目繁多,农民负担异常沉重。1933 年,镇平、内乡交界处有一比较富裕的农家,被内乡民团勒派盒子炮一支,结果出了 80 元了事。内乡县东乡张家村 300 多户,因负担太重,相率离村者 70 多家。某农家有地 1 顷,实际多是劣地,1932 年只产 2 担多稞子,而内乡自治办公处派该户 10 担,因负担不起,乃携带妻子离家他去,临行时愤愤地对人说,“谁要地拿地,谁要房子拿房子,我一辈子不回来了。”[13]114在匪患严重的邓县,人口减少程度惊人:邓县人口号称 70 万,经历年天灾人祸,死亡逃外者,约达十数万计。1933 年,邓县办保甲时,全县人口共计 52 万余人,“与原数相差十七八万之距。”[21]10相对于普通百姓的离村现象,邓县地主几乎无人敢住乡间,地主居城户只占 30%,70% 的地主则逃亡外县[36]。

其三、农村副业由盛转衰。南阳盆地农村副业有玉器业、泥业、竹业、丝业等,其中以丝业最盛。南阳县、南召、镇平、方城、桐柏等山区饲养山蚕,盛产柞绸。民国初期,方城拐河镇拥有织机 7 千张,丝绸行 64 家,年销银约 20 万余两[37]。在南召山区,几乎家家养蚕,户户缫丝,全县每年养蚕量达 6 万筐(每筐约 1 市斤卵量)左右,年产丝 40 万斤[38]。镇平北乡多养山蚕,山丝和山绸集中于石佛寺。在全盛的 1930 年,石佛寺有丝绸号 16 家,每年营业达百万[13]110。

在 20 世纪 2、30 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际,南阳各地“绸绌不知改进,应付时尚”,导致“销路渐塞”[39],南阳盆地农村经济不可避免地遭受影响。而南阳盆地崩溃的社会秩序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则进一步扼杀了柞蚕业的最后一线生机,使豫西南农村丝绸业盛极转衰。在方城拐河,1929 年自然灾害严重,蚕丝绸生产者极度困难。同年,杆首王太率 4000 余人,四天内两陷拐河,抢劫钱物,掳走商户当“肉票”,致使外地商人不愿停留,本地商人不敢操业[37]90。镇平每年本来可从织绸上取得 80 万元左右,在 1932 年以后,因销路停滞,丝绸号逐渐倒闭,每年营业不及 20 万元,失业者 2000 人。内乡西北,“近年养蚕的人家很少,绸子也和镇平一样,遭过了悲惨的命运。”[13]110-116。在南阳县第六区,因土匪阻隔,自然灾害,农户不重视蚕种更新,柞蚕业也走向破产[27]64。

其四、破败的水陆交通严重制约了当地农村经济的流通。近代以来,由于陆路交通的边缘化,南阳盆地的货物运输首靠境内唐、白、丹、湍四条水路,经汉水南达襄樊、汉口。清末,南阳县境内土产出境,“以黄豆、芝麻为大宗,缘湖北不产油料,故行销汉口特畅,计黄豆出境每年不下数万石,芝麻约五分之一,其余杂粮亦每年数千石。”[40]1926 年,《湖北实业月刊》卷 2 第 16 号记载:白河至汉水交汇处之张家湾,每年交易额为黄豆 20 万石,小麦、芝麻 20 万石,杂粮 3 万石,棉花交易尤盛[41]。然而时势易变,在 1928 年以后,“唐、白二河,皆因淤浅,舟楫被阻。”[2]2水运渐趋衰落,造成农产品严重滞销。

新野县因白河水路与湖北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该县大部分商品“多由汉口、老河口、樊城等处运来”[42]。自民国以来,由于白河河道淤塞,水位下降,航道逐渐缩短,加之军阀混战,河路匪患不断,新野商业贸易倍受打击。1929 年 1 月 21 日,匪首张连生率数百人,偷袭新野县新甸铺,烧毁白河西岸民船 200 余只,白河贸易严重受阻[43]。

如邓县,在汉水通行无阻时,该县农产品可运往襄樊、荆沙、武汉一带出售。烟叶、棉花、香油、大豆等输出的总量不在少数,仅烟叶一项,每年约在 2000 万斤以上。因匪患严重,河路不通,商人裹足,农产品堆如山积,价格狂跌,亦售不出。在邓县,因天灾人祸,土地荒芜,烟叶一项的产量,已减至 400 万斤,过去烟叶每百斤售至 18 元,1933 年仅售 5 元还找不到买主[14]16-17。

自 20 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丹江因土匪多、河霸多、杂税多,严重阻碍了当地商品的流通。荆紫

关地扼豫、鄂、陕三省咽喉,丹江航运是当地的主要运输渠道,至民初仍颇为发达。夏季水盛时,此地码头停泊货船多达三、四百艘,绵延数十里。据《淅川直隶厅乡土志》记载:岁出桐油约10万余斤;生漆约10万余斤;岁入盐约40万余斤;洋布、洋绸自汉口运入(水运)值万余金[44]。1924年,杆匪刘宝斌等在荆紫关沿街抢劫,烧毁南、北二街。1931年夏,丹江洪水暴涨,一夜间河市变为白沙洲。随着当地社会秩序的崩溃,匪患、河霸猖獗,不少船民弃船改行,有的沿街乞讨,还有的铤而走险当了土匪[45]。

南阳盆地的陆路交通落后且极不安全。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以南阳县为中心的6条陆路:许南路抵方城、许昌,南邓路抵邓县、老河口,南新路抵新野,南镇路抵镇平,南召路抵南召,南唐路抵唐河,"各路均甚宽,虽可行大车及汽车,但农产及其它货物的运输,还全靠牛车及大车。"[27]81在南阳盆地西部山区,陆路交通更为落后。若把内乡的桐油运到许昌,主要的运输工具是独轮车,来回一次要一个月左右,途中安全也没有保障。1933年,"(许昌)将到南阳的一二十里内,最易发生土匪劫车事,所以天色一黑,车夫便不敢开",唐河离南阳110里,"土匪出没无常,路上难免危险。"[13]105-124

随着南阳盆地社会生态的衰败,落后的水陆交通已成为制约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河运的衰落,陆路的危险,南阳盆地几陷于封锁状态之下;同时洋货却从平汉铁路的许昌车站转旱路源源而入南阳城乡各地,这使南阳盆地农村经济的破产日益加剧[20]1。

三、南阳盆地农家生活的极端贫困

南阳盆地因交通落后,又不断遭土匪骚扰,政府、军队的任意摊派,致使当地农村经济已濒临破产,农民生活水平降到最低程度。

南阳盆地农家生活穷苦,过着低水平的日子,"南人食米,北人食麦"在农村是不现实的。以南阳县为例,在1932年,全县农产为3841892担(百斤),除棉花外,尚余3833902担,全县人均522.8斤,价值为20.69元。内主要粮食(包括米谷类、豆菽类及甘薯)474.9斤,占总数的90.8%,人均400多斤粮食[27]72。但在农产收获时,农民往往急着使钱,廉价出卖农产品,青黄不接之时再用高价买进粮食,农民所受卖贱买贵的损失很大。加之南阳盆地地权高度集中于地主,而政府的摊派和军队的苛征,使佃农或小自耕农所获均不足以自给。

南阳县农民平日以甘薯、高粱馍、豌豆馍、小米、绿豆汤为主要食品,能吃小麦馍者很少。南召农民以玉蜀黍为主要食品,方城、邓县农民,"冬日有纯以甘薯为食者,切片晒干,用囤储藏,以备常年之需……白河、丹江流域,以芝麻叶为菜,以包谷糁为粥。"[46]1934年,郭伯恭在邓县调查时,"农民想尽俭省方法,拿蔬菜、树叶之类来代替粮食,每人1月的食用不过7、8角至1元而已,"村民食谷连皮都不去,连皮磨成面粉掺些红薯面,吃馍喝汤都是如此。他亲见一家3口1月仅吃3升玉米(约15斤),其掺加树叶、树皮之多可以想见[14]22。

若遇灾年,农民生活更加贫困。1929年,南阳盆地灾况严重,"灾民先食糠秕、禾秆、草根、树皮、土粉,今春则吃野菜、桐花、柳芽、槐叶,其不能入口之物,不能尽名。"[30]1930年,南阳大旱,农民以树皮、树叶、草根及碎石粉为食者亦不少[27]72。贫苦农民无计生存,只得卖儿鬻女。内乡县马山口自1935年起有"卖人市"出现,一直延续十多年[47]。

南阳盆地农民粗茶淡饭,很少食盐。南阳各县所用的盐,大都从许昌一带运来,因价格昂贵,农家有1斤盐吃3、4个月者,有整年不见盐,过阴历年称4两(合0.25斤)者[20]10。芝麻是唐、白河流域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香油是本地的特产,制油业也较发达,但食用者很少,4两油吃1年在农村也不算稀奇,"这也不是他们甘于吃苦,实在这样的节俭……甚或鬻妻卖子,债不能偿。"[14]16

在穿衣方面,南阳农民非常俭省,所用原料几乎全为土布,多数系自织。在邓县,大都是妇女自己纺线织布,在本地染坊染成蓝色,或包点黑色颜料,自己煮成灰色与黑色[14]15。农民的居住条件也非常恶劣,南阳全县有 164939 户,房屋 l 27514 所,内中瓦房占 1/5,草房占 4/5,而许多草房又是光线不足,简陋、空气不流通的住所,且屋少人多,拥挤不堪[27]71 - 73。

近代以来,僻处豫、鄂、陕边界的南阳盆地是一个因"边缘化"而成为社会生态失衡、社会经济衰败的典型区域。直到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势力尚不能实际控制该区,南阳盆地在地理及政治上皆属被漠视的"边缘地带"[49]。南阳盆地的"边缘化"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局部地区衰败的一个缩影,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秩序失衡的牺牲品。南阳盆地衰败的社会生态给当地农村社会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致使土地荒芜,农民离村,农村副业由盛而衰,交通秩序遭到破坏,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南阳盆地因"边缘化"而日趋衰败的社会生态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当地农家生活已降低至最低水平,成为南阳盆地"边缘化"的最大牺牲对象。

参考文献:

[1] 白眉初. 鲁豫晋三省志[M]. 北京:求知学社,1925.
[2] 今昔悬殊之南阳[J]. 河南政治月刊,1932,2(2).
[3] 王文楚. 古代交通地理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6:1.
[4] 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4:2.
[5] 马雪琴. 明中期流民问题与南阳盆地周边山地开发[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6] 吴世勋. 河南[M]. 上海:中华书局,1927:29.
[7] 潘守廉修,张嘉谋,纂. 南阳县志[M]. 光绪三十年刊本.
[8] 东亚同文会. 支那省别全志,第 8 册[M]. 日本:大正七年四月版:128.
[9] 尹松鑫. 源潭话兴衰[J]. 唐河县文史资料(3),1991:111 - 114.
[10] 南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南阳县志[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11] 乔新光. 军阀混战时期的南阳源潭话兴衰[J]. 南阳文史资料(2),1986:40 - 49.
[12] 南阳地区粮食局. 南阳地区粮食志[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08.
[13]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 河南省农村调查[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4] 郭伯恭. 经济崩溃过程中之邓县[J]. 湍声季刊,1935,(1).
[15] 邓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邓州市志[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5 - 27.
[16] 淅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淅川县志[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26 - 27.
[17] 内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内乡县志[M]. 北京:三联书店,1994:16 - 17.
[18]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 方城社会调查[J]. 河南统计月报,1936,2(9).
[19] 泌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泌阳县志[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20] 赵　纯. 南阳唐河间农村的现状[J]. 河南政治月刊,1934,4(4).
[21] 刘　峙. 我的回忆[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22] 贝思飞. 民国时期的土匪[M]. 徐有威,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9.
[2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民众运动[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23.
[24] 王克成,赵一凡. 中共南阳地方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9.
[25] 陈舜德. 闲话宛西集[M]. 台北:唯勤出版社,1979.
[26] 高云龙. 1931 年崔二旦杆匪盘踞唐县城十八天的惨状[M]//唐河县文史资料(2),1991:116 - 118.
[27] 冯紫岗,等. 南阳农村社会调查报告[M]. 上海:黎明书局,1934.
[28] 朱其华. 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M]. 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13.
[29] 朱新繁. 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M].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341.
[30] 邓县志编写委员会. 邓县志[M]. 邓县:内部编印本,1960:61.

[31] 姚雪垠. 长夜· 序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0.
[32] 湖北省政府民政厅. 湖北县政概况[M]. 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34:1090.
[33] 陈赓雅. 赣皖湘鄂视察记[M]. 上海:申报月刊社,1934:85.
[34]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 唐河社会调查[J]. 河南统计月报,1937,3(1).
[35] 雷海宗.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3.
[36]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 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R].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74.
[37] 朱兰亭. 庞竹卿和拐河[J]. 方城文史资料(5),1988.
[38] 河南柞蚕丝问题. 中农月刊[J]. 1945,(2).
[39] 刘茂增. 河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M]. 台北:成文出版社,(美)中文资料中心,1977:46587.
[40] 潘守廉. 南阳府南阳县户口、地土、物产、畜牧表图说[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65.
[41] 周殿均. 白河航运[M]. 南阳县文史资料(4),1990:24 -25.
[42]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 新野社会调查报告[J]. 河南统计月报,1936,2(12).
[43] 南阳地区交通志编纂委员会. 南阳地区交通志[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12.
[44] 佚 名. 浙川直隶厅乡土志[M]. 北京:线装书局影印本.
[45] 沟通南北水陆联运的桥梁——丹江[J]. 浙川文史资料(1),1985.
[46] 刘景向. 河南新志[M]. 郑州: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8:160.
[47] 张海明. 民国时期马山口"卖人市"见闻[J]. 内乡文史资料(7),1989.
[48] 张 信. 20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M]. 北京:中华书局,2004:272 -279.

The Decay of Rural Social Economy in Nanyang Basin in the 1920s and 1930s

LIU Zhen-hua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society of Nanyang Basin, which was gradually marginalized, broke down on a full scale because of the infliction by exorbitant taxes and levies from the dispatched troops and the molestation from the local bandits. As a result of the decay of the social ecology, the land was deserted as the peasants left their country, agriculture and sidelines industry fell into recession, transportation ran out of order, and the rural economy was on the verge of bankruptcy. What's worse, the collapse of social order and decay of social ecology aggravated penury so that the living standard in the local country was reduced to the lowest.

Key Words: Nanyang Basin; social ecology decay; rural economy; rural life